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宠儿》的历史重构和身份建构

李雨静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省成都市 610207

摘要: 托妮·莫里森是一位具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的黑人女作家, 她的长篇小说《宠儿》以19世纪后半叶废奴与重建时期为背景, 揭示了奴隶制阴霾下血淋淋的黑人历史。莫里森的历史观与格林新历史主义不谋而合。因此, 可以采用格林新历史主义思想对《宠儿》进行解读, 探索莫里森如何在还原历史、重构历史的过程中帮助黑人民族重返历史的话语空间, 完成黑人的身份建构, 并最终帮助他们重新走进历史的话语空间, 重塑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和身份地位, 这体现了莫里森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意识。

关键词: 新历史主义; 《宠儿》; 历史重构; 身份建构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 A Study of New Historicism in *Beloved*

Li Yujing

Sichu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7

Abstract: Toni Morrison, a black woman writer, is equipped with a great sens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whose long novel *Belov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abol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unveiling the miserable black history in the haze of the slavery.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Morrison's historical conception and Greenblatt's new historicism allows for the study of *Beloved*. The aim is to explore how does Morrison help the black return to the discourse space of history in the process of restoring and reconstructing history and eventually complete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Black Americans.

Keywords: New historicism; *Belove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1 新历史主义与莫里森《宠儿》写作背景

新历史主义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 它极具美国特色, 在刚兴起时就掀起了巨大的风波。本文采用的新历史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格林布列特的思想。格林布列特对新历史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 该思想是对旧历史主义的挑战, 它打破了文本和历史是相互孤立的局面, 拉近了文本和历史的距离, 主张文本和历史的互文阐释。格林布列特强调拨开历史谜团, 关注小人物、小历史片段, 关注鲜活个体, 学者的工作就是要“与死者对话”以及“让死者说话”。新历史主义强调利用文学的力量去探索历史中的真实存在, 利用自身的优势帮助重塑、表达和重建历史文化, 而不是掩盖和逃避事实。

70年代以来, 一批女作家活跃在美国黑人文学界, 其代表人物之一便是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托

妮·莫里森。莫里森颇具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 她聚焦黑人内部, 关心黑人妇女命运, 努力结合历史和现实语境以探索黑人文化身份的定位和建构。^{[1][7]}

在19世纪后半叶废奴与重建时期的写作背景下, 《宠儿》揭示奴隶制阴霾下血淋淋的黑人历史。《宠儿》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 莫里森重述了一段被淹没的关于奴隶制的故事。在莫里森在编辑《黑人之书》时接触到一个真实的事件: 19世纪50年代, 一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黑奴带着子女从肯塔基州逃至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在无法逃脱被捕命运之时,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她选择亲手结束小女儿的生命, 以此帮助孩子逃脱非人的生活。这一悲惨的故事在当时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废奴主义者将它作为宣传材料大肆宣扬。玛格丽特的故事令莫里森着迷, 但是莫里森觉得历史上的玛格丽特没有留下太多创作的空间, 莫里森认为

自己需要充分想象,进一步拓宽玛格丽特的想法,尤其是她在历史语境下的潜台词,虚构她的生活以更好的完成重构,这样才能将她的历史与关乎自由、妇女身份和地位的话题关联起来,这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主张的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莫里森从独特的视角回忆了这段不愿被人提及的历史,将奴隶制阴霾下血淋淋的黑人历史重现在读者的面前,同时在还原历史、重构历史的过程中完成了对黑人的身份建构。

2 《宠儿》对湮没历史的重构

一方面,源于奴隶制的创伤使得黑民族本身不愿再回忆痛苦,他们逐渐失去了表达的意识。另一方面,征服者对黑人文化的侵略和唾弃直接导致了黑人文化的边缘地位。黑人的历史和文化就是在这样别无选择的绝境中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随着黑人文学的蓬勃发展,一位位黑人作家肩负时代的使命,他们将湮没的历史和文化勇敢地拉到阳光下,忍住撕裂般疼痛揭开层层片段的面纱,诠释黑人的坎坷生活 and 不幸遭遇,解读他们对身份的困惑、对属性的渴求和对现实的反抗。然而,艺术家对于历史的记录并不仅仅是创作内容那么简单,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会涉及对权力话语的颠覆。正如莫里森曾感叹,挖掘黑民族历史对国家的意义非凡,我们既然不能谴责征服者书写历史的方式,但是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反驳^{[11]09}。

格林布列的文化诗学强调将“大历史”化为“小历史”,将单数历史复数化,这与莫里森对《宠儿》的谋篇布局不谋而合。莫里森并没有在南北战争这个大历史背景中对黑人奴隶史展开描述,她已一个小人物女黑女奴作为切入点。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塞丝”,就是现实历史事件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加纳,她的“弑婴”行为是邪恶的奴隶制造成的结果,伟大的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再遭受非人的生活,重获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结束婴儿的生命。以“塞丝”为代表,莫里森折射的是整个惨绝人寰却被无限边缘化的黑人奴隶史。

莫里森为小说的创作创造了一个颇具深意的词汇——“重现回忆”。不同于单纯的回忆,在《宠儿》中,它更多强调的是奴隶制造成黑人心灵创伤的阴影,它既是个体的回忆,也是集体的回忆,更是整个民族的回忆。

主人公塞丝和小女儿丹芙生活在编号为一百二十四的这座房子中,她曾弑杀的婴儿“变成鬼魂”骚扰着她的生活。她在这座房子中与痛苦的回忆斗争。塞丝将自己的记忆比做一幅画,以此解释尽管努力克制自己不去回想,但是记忆总是客观存在于自己生活的世界中。即

便塞丝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但是“甜蜜之家”、“学校老师”给她造成的痛苦,她永远无法忘记,并且努力让自己的孩子逃离苦海。塞丝深受奴隶制的戕害,她认为自己拥有的最纯洁的东西就是她的孩子,她不忍心让他们再受到迫害,于是她带着孩子们逃跑。当她成功从“甜蜜之家”逃出来,并享受了二十八天“正常”生活之后,梦魇再次降临她的生活。当她看到那顶熟悉的帽子时,她把她的孩子们带到棚子里,不停地往墙上撞,并用斧头抹了其中一个孩子的脖子……奴隶制带给塞丝的阴影是难以言喻的,她很爱她的孩子,但痛苦使她的母爱畸形,她没有第二种选择。

贝比·苏格斯是塞丝的婆婆,她曾是一位老黑奴,被救赎以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几十年的奴役生活是如此的疲惫,她已经忘却了鲜活的心脏是如此有规律地跳动着。她仔细端详自己的手,好像那双手生来就是属于别人的、不停为别人干活的,只有此刻是属于自己的。在奴隶制的压迫下,千万个贝比对生活早已麻木,他们早就失去了自我,贝比说过“那些白鬼夺走了我拥有和梦想的一切”。^{[2]103}在贝比生命中最后一天的那个下午,她吐露历经苦难后终于意识到,那些征服者永远不会体会黑人的苦楚,更不会因此停下残害的脚步。她的身体备受折磨,只有靠心灵支撑生活,并帮助那些获得自由却丢了灵魂的黑人寻找生命的光芒。^{[3]157}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所坚信的信义还是崩溃了。

保罗·D作为“甜蜜之家”黑人社区唯一劫后余生者,他用自己强壮的肉身和坚强的意志证明了生命的韧性。保罗·D同样认为锁住记忆是劫后余生的必要生存手段。^{[11]15}

每个人都试图锁住记忆,但是打开记忆闸门的后果又是什么呢?化为鬼魂又以肉身归来的宠儿就是一把“重现记忆”之门的钥匙。《宠儿》无疑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但是读者对于宠儿的身份难以把握。因为那鬼魂在一百二十四号无尽地折磨着塞丝、丹芙和贝比,直到保罗·D来到一百二十四号将它赶走。还阳人间的宠儿到底是“报复者”,还是奢求母爱的“贪婪者”。一方面,塞丝在“林间空地”感受到后颈被卡,丹芙看到那是宠儿的脸;另一方面,宠儿对塞丝极其依赖,她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塞丝。她对丹芙说,塞丝是她需要的,她可以没有丹芙,但是不能没有塞丝。

宠儿对母爱的贪婪和渴求正是奴隶制度下黑人奴隶的缩影,他们渴望亲情,他们生下来就被贩卖,幸运的话,能喝上不知道是谁的奶水。但是,无情的制度将他

们的渴望抹杀，他们没有追求爱与被爱的权力。《宠儿》扉页上的数字，记录的是奴隶制期间贩卖奴隶的人数，有着六千万甚至是更多的黑人。而这也存在于宠儿的记忆中。杨仁敬等人认为，宠儿是小说中一个隐喻性的存在。莫里森创作宠儿，使魂魄充满真实性，并赋予其非同寻常的气质。莫里森这样的创作目的是为了那段历史与记忆变得可触可感。可以认为，宠儿代表的是黑人族心里关于奴隶制的民族记忆，是“重现回忆”的具体化表现。^{[1]116}

美国记录历史的方法非常客观，其备受小说的质疑与攻击，因此需要创作者重新想象缺失的、未被记录甚至是被遗忘的历史，尽可能填补历史的空隙。^{[4]44}莫里森的目的不是要重新创造历史，也不只仅仅是回顾一个悲惨的世界和一段边缘的历史，而是审视历史，并且还原奴隶制罄竹难书的真相，帮助黑人填补缺失的记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意识让莫里森清醒地意识到，她要做一个“见证人”，拨开这段历史的谜团，以拯救和鼓舞黑人民族的心灵和向生的勇气。^{[1]108}

3 《宠儿》中黑人的身份建构

《宠儿》控诉了奴隶制对黑人民族造成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残害，更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深入到心灵深处。在奴隶主的霸权管控下，他们忘记了民族文化，被迫丢失自主性，并逐渐内化。莫里森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揭示了黑人奴隶是如何一步步被物化、被他者化，最终丧失自主性，同时也描述了黑人为身份建构，重拾自主性的挣扎。

奴隶主剥夺黑人奴隶的话语权，将他们逐出话语空间。莫里森在小说中多次提到“马嚼子”，这是保罗·D戴在嘴上的东西。1993年，托妮·莫里森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提到，给黑人奴隶戴马嚼子是一种惩罚方式，既可以让他们闭嘴又不妨碍干活。莫里森没有在小说中具体描写马嚼子的形态，而是多处着墨直接描述黑人奴隶戴上它的感觉，如舌头被马嚼子勒住是何其难受，连吐唾沫这样的基本生理需求都无法满足。^{[2]82}保罗·D遭受的创伤使他不断否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他觉得自己连院子里的公鸡“先生”都不如。他认为“先生”拥有自由，拥有姓名，而自己却没有自由，更没有属于自己的姓名。

“学校老师”是加纳的妹夫，这个指称是莫里森采用的借代手法。一般来说，“学校老师”是知识、智慧、儒雅的象征，但是《宠儿》中的“学校老师”是一个残酷的种族主义者。虽然加纳对奴隶的仁慈充满了伪善，

但“学校老师”的到来终结了“甜蜜之家”仅存的自由和快乐。西克索烤了猪崽，认为自己吃饱了才有力气为“学校老师”干更多的活儿。“学校老师”揍了他，并告诉西克索自己才是那个有权利下定义的人，西克必须无条件服从，没有反抗辩驳的权力。^{[2]20}“学校老师”还给奴隶规定了动物属性，为了研究黑人的“人的属性”和“动物属性”与白人的属性有何不同，他拿着测量绳缠绕塞丝的大脑，带过鼻子，划过屁股，仔细计数她的牙齿。^{[2]22}可怜的塞丝不懂得属性的意思，在多次询问加纳夫人后终于明白，原来在“学校老师”的眼里自己是个长着四只脚的家伙。

黑人奴隶自主性的丧失还表现在家庭的毁灭。^{[1]11}以贝比为例，她一生生过八个孩子，每一个都离开了他。“四个给逮走了，四个被人追捕”，^{[2]6}她没有享受过家庭的团圆。塞丝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她只在田里见过母亲几回，只喝过两三个星期的奶水。母亲总是在田地里种稻子忙碌着。母亲不在的时候，另一个看孩子的女人代母亲喂养塞丝。塞丝从小便缺少母亲的关怀，母女之间亲昵的举动、爱抚，塞丝从未享受过，一直到后来母亲被吊死了。^{[2]71}正是因为小时候缺失母爱，她知道奶水对孩子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当她的奶水被抢的时候，她拼了命的反抗，那是她唯一一次被别人抢了奶水——他们按倒她抢的。^{[2]232}

忍受着奴隶制度的戕害，黑人奴隶也试图为自我救赎努力。《宠儿》中重新追求话语权的人物代表是贝比。贝比同那些劫后余生的黑人男女和孩子们在“林间空地”自由表达、大声哭泣、一起跳舞。她教人们热爱自己的肉体，强烈地热爱它。^{[2]102}在贝比的心灵的率领下，人们尽情发泄。在塞丝度过的二十八天——整整一轮月缺月圆——的非奴隶生活中，一点点地，在一百二十四号和“林间空地”上，同大家在一起，塞丝赢得了自我。解放自我是一回事；赢得那个解放了的自我的所有权确是另一回事。^{[2]110}贝比和塞丝都为重构自主性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每当她们重拾自我的时候，征服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将她们打入绝望。

塞丝母性地位与奴隶制冲突的结果是弑婴这一行为，这是塞丝对奴隶制绝望的反抗；西克索在生命受到奴隶制挑战的最后一刻，他没有摇尾乞怜，而是高昂地唱起歌来，那歌生是如此的富有力量，充满狂放不羁地憎恨，那时极具非洲特色的一种舞蹈节拍——朱巴。莫里森在此处的描写，表现了她力图寻找和捍卫民族文化的使命，借以小说鼓舞黑人民族重建黑人文化的曙光。

在《宠儿》中，莫里森让人物重拾自主性，完成身份建构的重要标志是与世隔绝十二年之久的丹芙主动走出一百二十四号，向蓝石路的黑人寻求帮助，三十一个黑人女人帮助塞丝走出了阴霾，赶跑了宠儿。这传递出莫里森的观点，只有黑人社区这个集体，甚至是整个黑人民族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才能渡人渡己，挥别过去的痛楚。因为痛苦的记忆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是整个民族记忆。只有把“他的故事和她的故事放到一起，^{[23]17}疗愈和走出阴影的方式就是把个人的故事、两个人的故事和群体的故事放在一起。^{[1]17}

4 结语

奴隶制已经结束了，《宠儿》叙述的是奴隶制的余威，莫里森借个体的心理创伤揭露了美国黑人的集体创伤。同时，这又不仅仅是黑人种族心灵上的创伤、还有整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践踏和毁灭。莫里森意识到历史是权力的产物，所以她有更多的责任要去还原历史的真

实性，她用文字拼凑出一座墓碑，笔直地立在那里，除了祭奠，更多的是警醒。小说末尾，莫里森感叹到这个故事不可重复、不可流传，^{[23]19}屈辱的岁月就像宠儿这个幽魂一样盘踞在那一代人的心中，无法抹去，她希望可以透过《宠儿》，重构历史真相，帮助他们重新走进历史的话语空间，重塑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和身份地位，这体现了莫里森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意识。

参考文献：

- [1]杨仁敬.新历史主义与美国少数族裔小说[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 [2]托妮·莫里森.宠儿[M].潘岳,雷格,译.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09.
- [3]罗毅.打破沉默的沉默 《宠儿》的多维度解读[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 [4]王玉括.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重构《宠儿》[J].外国文学研究,2007(01):140-145.